

中欧大学系列讲座

第四讲

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

2009年10月

今天我想探讨一下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以及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我将间接地涉及这个主题，首先介绍一下一个最近才引起我注意的一个现象，但它在我的思维中已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我几乎可称之为我的理念框架的第四个支柱。这个现象就是主体及其代理人的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

代理人理应代表其主体的利益，但是事实上他们趋于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所应代表的人的利益之上。这就是代理人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被经济学家们广泛分析过，但完全是从合同和经济刺激（incentives）的角度，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伦理和价值观问题。而剔除伦理因素，问题就变得很难驾驭。如果象诚实和正直这样的价值观在人们的行为中失去控制，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只受经济动机的刺激。

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的无价值取向，实际上是削弱了道德价值观。

市场被假设为是被无形之手操纵，因而十分有效。参与者在做买与卖的决定时无需进行道德判断，因为其行为不应对市场价值有任何有形可见的影响。

事实上，主宰金融市场的条例规定是由政治家的有形之手决定的，因此在代议制的民主社会中，政治家有代理人的问题。

这样，代理人问题对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都提出了不涉及道德原则将无法解决的严重挑战。

这也就是为什么代理人问题在我的思考中占了如此重要的位置。我想先分析一下代理人问题，然后再讲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的矛盾冲突。

现在让我从头说起。

我最早接触代理人问题是与所谓的“资源诅咒”有关。我指的资源诅咒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常常受腐败或专制政府、暴动和内战的折磨，致使那里的人们比自然资源较不富有的国家的人民更贫困，生活更悲惨。例如刚果、苏丹、塞拉利昂和利比亚。

我支持的非政府机构之一“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依据“公布支付”的口号(Publish What You Pay)发起了一个运动，敦促石油公司和矿业公司公布他们对各国政府的支付。这样人民可以计算，知道政府从资源所得，并令其负责说明其使用。

于 2002 年发起的这个运动有一段有趣的经历。这个主意结果成了一个易扩散的谬误(fertile fallacy)，因为尽管公众舆论可以对大石油公司施加足够的压力，但是夜逃的操作者(fly-by-night operators)和住在非民主政体国家的大公司不大易受影响和约束。所以支付总额无法计算。

所幸，这一事业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发起了“采掘业透明度倡议”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将政府、大公司、和公民社会聚集在一起，建立对大公司和政府都适用的透明度国际标准。签署了此倡议的国家，政府负责公布收入数额，在尼日利亚和阿塞拜疆等国已经实行。

在分析资源诅咒问题时，我开始重视我称之为“不对称的代理人问题”。根据现代主权理论，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属于它的人民。但是其政府，本应是人民的代理人，却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所应代表的人民的利益之上，从事各种腐败活动。而另一方面，国际石油和矿业公司的管理层，对其公司的利益又代表得过分好，他们过分到贿赂政府以取得特许。对这种贿赂的心甘情愿的给予和接受，是资源诅咒的根源。

一旦意识到了代理人的问题，我发现它比比皆是。

共产主义的失败是因为代理人的问题。卡尔·马克思关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主张很有吸引力，但是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将他们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之上。

代理人问题也是代议制民主的祸根：被选出的代表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而损害公众利益。

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代理人问题被证实是金融体制垮台的原因。当金融策划者(financial engineers) 通过发行债务抵押债券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 or CDO) ，将房屋抵押贷款 (mortgage) 变为证券 (securities) 时，他们以为是在通过地

理分布多样化减少风险。而事实上是由于将创造和分发合成证券的代理人的利益与证券所有人的利益分割开来，而引进了一种新的风险。代理人更感兴趣的是赚取手续费而不是保护其主体的利益。

所以代理人问题似乎无所不在。

然而尽管其影响普遍深入，但直到相当近期，这个问题一直未引起人们注意。在我当学生的时候几乎完全没有被认识。过去二十年中注意的人多了一些，但主要是研究合同及经济利益刺激的经济学者。实际上，代理人问题更多的是伦理道德问题，而从合同及经济利益角度的分析，其实更突出了道德问题。确立人的行为是受合同及经济利益主宰的原则，其效果是取消或至少是减少了道德因素的考量。这听上去似乎违反常理，正是因为相关反射论还没有被很好地理解。

价值观不如认知观念与客观现实的联系更密切，因而更容易受人们所接受的理论的影响，经济学理论就是一个佐证。市场被认为应该像无形的手使供求平衡。无形之手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不需要做道德判断；所有的价值都可以用钱来表达，而钱是可互换的。罗马人曾经说“钱是闻不到味儿的”。但是如果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人的行为都是被个人利益左右，就没有了道德判断的余地 – 而缺乏伦理戒律，社会无法存在。

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受市场价值左右，而市场价值在性质上，与人们作为社会成员时左右他们行为的道德价值很不相同。这引出了我尚未能解决的、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矛盾的一系列有关问题。同时我也被布鲁斯·斯考特 (Bruce R. Scott)

简短的专著“资本主义的概念”所鼓舞。结果我可能有了新的见解。的确，我自己都被我得出的一些结论震动了。

斯考特指出，资本主义被解释错误，与市场机制混为一谈。他将此扭曲主要归因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我不这么具体指某个人，而是将其归因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斯考特还说，无形的市场之手的背后潜藏着人的机构的有形之手，即制定条规的政治程序。这里就出现了代理人问题，也出现了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问题。

美国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民主国家和开放社会，受宪法法治保护。同时，美国的经济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上，允许个人在不受政府机构独断行为的不适当干预下自由交换。这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看起来相配得天衣无缝。人们可以轻易地将开放社会与市场经济相提并论，许多人，包括我自己，也经常这样做。但表面现象容易使人误解。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有根深蒂固的矛盾冲突。但这一一直被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成功地掩盖着，它从 80 年代里根执政时期起开始占上风。

市场机制的明显特征是非道德化(amoral)：一个人的元钱与另一个人的元钱完全等值，不论它是怎样获得的。正是这一点使市场变得如此有效：参与者不需要考虑道德因素。在一个有效市场中，个人的决定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很小：一个人不参与买或卖，另一个人会以很小的差别取而代之。因此个人市场参与者对市场价格的结果责任不大。

但市场仅适合做个人选择，而不适合做社会决策。市场允许个人参与者进行自由交换，这不是为进行社会选择而设计的。制定管辖社会的条规，包括市场机制应如何运作，是政治事务的权限。将自由存在、自我管辖、自我调整的市场理念延伸到政治领域，颇具欺骗性，因为它从政治中排除了伦理道德考量，而没有这种考量政治无法正常运作。

美国的政治体制是采用代议制民主。人民选出代表行使权力，他们应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代理人；但实际上，他们倾向于将其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竞选要花很多钱，当选的代表感恩于支持者。不按这个游戏规则玩的人不能当选。这正是金钱如何污染政治，特殊利益如何战胜公众利益。

美国政治体制中的代理人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它是代议制民主中固有的。对当选的代表提出要求的权力是写在宪法里的，但是当今代理人问题似乎比我 1956 年刚来美国是要严重得多。这是为什么？

若干客观历史的发展或许对此负有某种责任，诸如复杂的操纵公众观点的手段的发展，特殊利益集团的增长等，但公众道德水准下降的主要罪魁祸首，还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我愿意相信在共和国初建时，公民是真心地受公民道德的引导。所幸，建国之父们没有把信念过多地依赖于此，而是建立在宪法中的分权制：首创了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即使在我 1956 年初来美国时，人们仍然承认是将象诚实正直这样的内在价值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考虑到在暗中进行的各种不道德行

为，这或许有些虚伪，但它毕竟不同于当今的公众生活 – 赤裸裸地公开承认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成功就受到敬慕，不论是怎样得到的。

我不想被误解。把过去描绘得过于美好是上了年纪人的特点，我不想陷入这么明显的陷阱。我不是说 1956 年时政治家们更诚实，或是社会更公正。自那时以来美国在透明度、负责任、和社会平等上已有巨大进展。但是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在什么是可以被接受甚至被仰慕的社会行为上也有了重大改变。我所形容的公众道德的下降，是非常具体的与市场价值的非道德性 (amorality) 相比而言。

我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定义是，将市场价值不适合地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特别是政治领域。经济学理论声称，在一般均衡的情况下，无形之手会确保资源的最佳分配。这意味着，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也间接地服务于公众利益。这就给了个人利益和利润动机以道德上的许可，允许其取代象诚实、正直、为他人着想等美德。

这个论点有几处站不住脚。第一，金融市场不是趋向均衡。一般均衡论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认定供给与需求的状况是独立存在的，市场的无形之手继而会将供给与需求导向均衡。这种说法忽略了市场价格与潜在的供给与需求情况之间的相关环形反馈；也忽略了隐蔽在市场机制背后的政治程序的有形之手的作用。

第二，一般均衡论认为资源的初始分配是既定的。这排除了社会公平正义的考量。更重要的是，该理论假定人们知道自身的利益是什么，而且知道怎样最好地

追求这个利益。实际上，在人的想法与事实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尽管如此，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一个原因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一个主要政策内涵，即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限制在最低程度，是不正确的，但为其辩护的论据更荒谬。市场机制可能有缺陷，但政治程序更是如此。政治程序的参与者比市场参与者更容易出错，因为政治是围绕社会价值运作，而市场参与者的价值是已知既定的。如我们所知，社会价值极易受操纵的影响，而且政治里充满了有害的代理人问题。为了防止这一点，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这使经济领域的政府机构比私人参与者的行为要僵化官僚得多。所有这些都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限制在最低限度的论点显得有道理。因此，市场原教旨主义只是取代了一个不正确的论点，而应该有的，是一个更强有力的论点，即所有的人的作为都是不完美的，社会选择亦即选择较差的邪恶，根据这些，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限制在最低限度。这才是一个有道理的论点。相反，他们说政府干预的失败证明自由的市场是完美的。这是完全错误的逻辑推理。

我想明确说明的是，我谴责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个错误和危险的教义，但是为了其他更好的理由，我支持将政府的干预和规定限制在最低限度。

远远超过一切的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最强有力的推动，是因为它可以为资本拥有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利益服务。财富的分配是既定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被认为是有利于公众利益，控制资本的人还能再要求奢望什么呢？他们构成的富足的强有力的集团，很有优势推销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仅是通过认知的理论，而且通过积极操纵公众舆论。市场原教旨主义给本来是非道德性的市场机制赋予了一种道德特性，

即将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变为一种公德，类似对真理的追求。它是靠操纵的力量而不是靠理性的力量获胜的。它被一个强有力的财力雄厚的宣传机器所支持，曲扭公众对自身利益的理解。例如，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取消只适用于人口百分之一的上层人士的遗产税的劝说会如此成功？

当然在这个领域还有其他竞争的力量在使用类似的操纵手段，但他们的资助不够丰厚，因为他们未能吸引人口中最富有、最有实力的阶层的自身利益。这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怎样在过去 25 年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而且即使是金融危机也不足以削弱其影响。奥巴马总统的决定显示了这一点，避免用给政府以多数控股权的方式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recapitalizing the banks）。

市场原教旨主义不应与有效市场假定论混为一谈。用有效市场假定论运作的经济学家，不一定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确，很多经济学家是颇具同情心的自由派。但是有效市场假定论占据了美国大学的经济学讲坛，这可归因于坚信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资本家和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也应应对市场价值侵入其他学科领域负责，如法学和政治学。

资本主义不象苏联的共产主义那样与开放社会针锋相对。尽管如此它仍对开放社会有一些严重威胁。我已经提到了其中一点，即金融市场不是趋向均衡，而是易产生泡沫。监管机制的解体促使了超级泡沫的产生，其崩溃会对今后若干年美

国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这又揭示了对开放社会的另一威胁：代理人问题和金钱对政治的影响，污染了政治程序。

在开放社会中，政治程序应为公众利益服务；而当今的美国，政治程序已被特殊利益把持。我们选举的代表感恩于赞助了他们竞选的人，而不是一般的选民。正在发生的，对奥巴马总统关于医疗制度改革和能源法案的反应，提供了生动的说明。选民已被洗脑到如此地步，以至对有关公共利益进行负责任的讨论几乎变得不可能，使全国保健服务和碳排放征税都行不通。我们的选择局限于特殊利益能操纵的方案。

游说是代理人问题的核心。怎么样才能使之得到控制？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不是调整经济刺激的问题。游说的利润很高，而且即使管理条规更严格了仍会如此。在缺乏道德价值取向时总有办法绕过条规。更糟的是，条规的设计制订本身也是为特殊利益，而不是为公众服务的。这是今天的美国一个受了重创的金融体系试图重新获得以往的优势时所面临的危险。

有一个解决道德问题的办法：需要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划分清楚的界限。市场参与和条规制定是两个不同的功能。市场允许参与者自由交换，在这里参与者可以合法地以利润为动机。与此相比，制定和实施条规应以公众利益的考量为指南，利润动机在这里不适合。当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优势歪曲条规时，政治程序就会变得腐败，代议制民主也不会产生开放社会作为可取的社会组织形式所应有的结果。

应该强调，这一论点与目前时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态度直接冲突，而且这个教义在涉及政治市场。

怎样改进开放社会中的政治程序？我提出一个很简单的规则办法：人们应区分其作为市场参与者和政治参与者的作用。作为市场参与者我们可以追求个人利益；作为政治程序的参与者，我们应以公共利益为指南。阐明这个规则的道理也很简单。在接近完美竞争的情况下，没有单个的竞争者可以影响最终结果，所以个人在市场的决定对社会状况没有影响，不论参与者是否在意公共利益。但是政治决定却会影响社会情况，所以决定是否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结果会截然不同。

问题是公共利益无法用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客观标准来决定，它取决于选民的看法，而在没有客观标准的情况下，看法很容易被操纵。操纵是自我强化的；政治主张和相反的主张说得越让人难以相信，越难辨对与错。正是这一点使得政治程序的效率极低。

相比之下，市场机制的运作要好得多。人们或许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是好的，但利润提供了衡量参与者表现的客观标准。难怪利润动机在引导人的行为的价值取向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利润不仅提供了达到人所追求的不论是什么目的的手段，而且它本身也是目的。因为作为衡量成功的可靠尺度，利润可吸引他人的赞赏和改善自我感觉。的确许多成功的生意人对赚钱比对使用自己的财富更有安全感。

市场价值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回顾历史，基督教曾把追求利润作为是有罪不道德的。这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后来的宗教改革促进了市场的发展，打

开了物质进步和积累财富的途径。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传统的关系被契约关系代替。契约关系渗透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最终，人之间的关系开始被交易取代。变化的步伐在继续加快；在我一生中变化的速度十分惊人。

我在匈牙利的童年时期和在美国的成年人的生活差异甚大；1956年来美国时与今天的美国相比也差异甚大。刚来美国时对我触动很大的是，我看到与匈牙利甚至与英国相比，市场价值已经多么深入地渗透进美国社会。在英国，传统价值和阶级划分仍占上风。从那时以来英国和美国都经历了更大的变化。象医疗和法律这样的专业也变成了生意。在我看来，这对社会造成的不稳定效果，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对金融市场造成的不稳定效果是一样的。

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稳定程度当然各人的看法不同。同样，在法律、医疗和媒体这样的专业中，利润的动机应占什么样的位置也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毫无疑问，利润动机在政治领域已有极坏的影响，因为它恶化了代理人问题。

怎样使代理人问题减少到最低限度？想让有重大利害的特殊利益集团不去游说国会，是期望太高而不可能的。烟草工业一定要反对禁止吸烟的立法，保险业也一定反对单一支付的医疗体制。但是在公众利益上，那些没有重大利害相关的人们的利益，应被置于比狭隘利益者优先的地位。没有特殊利益的人不必担心所谓的“搭便车问题”，即行为自私的其他人会从他们不自私的行为中受益，因为这种运作的目的不是使公众受益。

归纳起来，昨天我讲了认知功能应被置于操纵功能之上。今天我讲的是，尽管在现行条规制度下利润动机是完全合理的，但在制定条规时公众利益应被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我坚信，选民中即使有一小部分人达到这两个要求，代议制民主也会运作得更好。

我想讲一点个人的事来结束。我所讲的也是我在身体力行的。作为对冲基金经理者，我按游戏规则试图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作为一个公民，我试图改变这些规则，即使改革不符合我个人的利益。比如，我和其他金融机构一起支持对对冲基金实行监管。我坚信，如果更多的人按这个原则办事，我们的政治制度的功能可以好一些。我也相信象我这样的基金会之所以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恰恰是因为遵循这一原则的人太少了。

在我的基金会，即开放社会研究所，我们把保护公众利益不受私人利益侵犯作为自己的任务。我们也支持公民社会要求政府负责任。我把这些努力称为政治公益慈善事业，我相信它比传统的慈善事业对改变世界会有更大的贡献，因为这样做的人很少。

我处于一个很有利的地位。我比多数人更独立，因为我不必依靠客户或顾客，而且我感到有道德义务更好地利用我的地位优势。当然特殊利益的力量大大超过于我，但我至少有一种满足感，即我的钱有更大的稀有价值(scarcity value)。

问题是，特殊利益也在试图装扮自己是为了公众利益，需要慧眼来识别真伪，特别是双方都被迫使用类似的说服手段。在缺乏客观标准的情况下，人们只能

通过试验摸索的过程(trial and error) 来做出判断。讨论中有良好意愿的一方，往往很难相信另一方的人有同样的良好愿望。最好的识别办法，是在认可其宣称的主张的表面价值(face value) 的同时，和他们进行实质性的讨论。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政治讨论中给认知功能以优先地位。只有当对方不这样回应时，才应该不再考虑和理睬。这样的人在每个国家都有；不幸的是在美国他们不被 忽视，而且变得非常有影响力。选民是否拒绝被完全无视真相而试图操纵他们的人所影响，是对每个开放社会能否保持开放的检验。鉴于奥威尔式的宣传(Orwellian propaganda) 的成功，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

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为美国服务得很好政治程序看起来已经退化。我们曾经有两个政党为中间地带竞争，但是中间地带已经萎缩，政治越来越两极分化。奥巴马总统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扭转这个趋势，试图做一个有团结聚合力的领导者，但无济于事。

归根结底，民主制度怎样运作取决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我认为如果更多的美国人将他们作为政治参与者的作用与作为市场参与者的作用区别开来，美国的民主制度会运行的更好。这取决于每个人。我已经这样做了。即使是一个小的少数群体，对重建正在消失的中间立场也会有帮助。

谢谢。